

《域外小说集》：复古作启蒙

彭勇穗

内容提要 周氏兄弟复古思想包含批判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反封建、古代理想人格想象等意涵，深具反思想他治、追求主体性的启蒙精神。启蒙亦是其国民性改造纲领，他们以文学为启蒙手段，发掘“诗言志”文学精神，并与西方启蒙思想结合，形成启蒙文学。启蒙翻译文学兼具翻译和启蒙双属性，以启蒙为主导，文学启蒙并非说教，而是以陌生化技巧启发读者。《域外小说集》之文字复古，既以转移补偿策略模仿原作陌生化技巧，又以朴正、质朴、讷涩等特征挑战本土不同名人译作风格，激发读者反思文化帝国主义、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改良方案。

关键词 复古思想；启蒙精神；启蒙（翻译）文学；陌生化技巧；文字复古

《域外小说集》是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令人费解的景观。书中译文一方面文字“古奥”^[1]，被认为“近乎倒退”^[2]，“远未走出传统的藩篱”^[3]；另一方面又前卫，译法被称为“五四直译运动前车”^[4]，思想主题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5]。“倒退”的“前车”，“古奥”的“先声”，反差极大。周氏兄弟为何以复古文字译域外新声，其中有何意义，这涉及周氏兄弟文学翻译思想的定性，涉及《域外小说集》在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演变脉络中的定位，值得刨问。

一 复古思想中的启蒙精神

解读《域外小说集》古文的动因、意义，先要把握当时周氏兄弟复古思想的渊源、内涵、本质。《摩罗诗力说》称，“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6]，是说其“古”“新”同质，求新基于怀古，亦期助于复古，所以他们希望借翻译“取今复古”^[7]，融合域外之“新”与本国之“古”，推动“中国文事复兴”^[8]。因而，以古文译《域外小说集》，寄寓了二人的文学复兴之梦。以复古寄托文学复兴梦，周氏兄弟是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启发。鲁迅曾筹办《新生》杂志，刊名“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9]；虽未果，但相关文章在《河南》陆续发表，《摩罗诗力说》即其一，该文开

篇即举但丁例。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亦借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10]批评中国文学现状。《域外小说集》“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11]，即二人效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实践。该书封面印古希腊少女抱竖琴图，图下先秦篆文^[12]，除见证二人师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的经历，更借图文并置，以复先秦之古比附复希腊之古。这种比附是当时“古学复兴”思潮的普遍心理，被赋予多种意义，章太炎和梁启超的视角对周氏兄弟影响较大。

章太炎 1906 年称，“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13]。他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作比，主张“复古”先行，回归“姬汉”“东夏”先秦古文，唤醒国人汉民族意识，以求民族“中兴”。“中兴”一语表明，章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想象浸润着中国古代历史想象。《摩罗诗力说》开篇强调但丁文学的民族意义，期待“中国文事复兴”，视角颇似章氏。不过，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又不只是汉民族主义，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汉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除了满汉之别，亦含全球视野下的中西之别和超越血统的人文精神。

梁启超 1902 年也以先秦比附古希腊，提出“古学复兴时代”，其“复古”是学术批判，意在

消解儒家权威,追求思想解放,复先秦之古旨在根本上摆脱孔孟思想束缚,实现“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14]。梁还以“新民说”和“新小说”建构国民性纲领为旨归。“新民说”期待国人成为“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的“国民”,能行“一身之自治”“一群之自治”^[15];“新小说”提出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6],主张用政治小说培养国民现代政治素质。这是梁氏改良思想之一。

周作人坦言他们曾受《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影响^[17]。《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就批判儒家思想“束缚人心”^[18]。《摩罗诗力说》亦提出,古代的“诗”(广义,即文学)本有“言志”“撷人”之能,后为“帝”所不容,为“民”之封建道德所不容(这里“民”指封建统治阶级),为“儒服之士”的“持人性情”“无邪”之文学观所不容^[19];他希望复苏古代文学“言志”精神,反抗“持人性情”的封建文学观,使国人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获得精神自由^[20]。

鲁迅还提出与“新民说”相对的“古民说”,赋予“复古”独特意涵。他说:“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闕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21]还说“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俗移,转为新儒”^[22]。“古”的含义不特指先秦,泛指上古、远古;“文化”批判也不限于“封建”,泛指使人“转为新儒”的“文明”,即固化、束缚人的文化。“古民说”想象古人“道其能道”的摩罗诗力和“武健勇烈”的精神,称为“神思”和“白心”。“神思”指个体创造性想象力,“白心”指个体独立意志^[23]。两者建构古代理想人格想象——不受思想束缚、以独立意志为核心的主体性精神。《摩罗诗力说》“性解”一词是这种人格的化身,《域外小说集》序称要培养国人“性解思惟”^[24],与此一脉相连,寄寓着对国人主体性精神的希冀。

这种复古思想内含独特启蒙精神。康德认为启蒙是“使人从自我强加、没有他人指引便不能使用自己理解力的不成熟状态(imaturity)摆脱出来……‘勇于使用自己的理性’是启蒙格言”^[25],其精髓是反抗思想他治和教条主义,它拒绝未经独立反思便盲目接受或断然反对某种思想,核心是使

人“不屈从于任何形式的权威而运用人类自身的理性”^[26]。拒绝教条权威未必是拒绝特定思想本身,也未必以接受或拒绝的二元态度待之,启蒙精神“拒绝任何以简单化、专断化的二元选项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27]。主体接受,拒绝,拒绝中接受,或接受中拒绝某思想,不只因思想本身,更是主体理性审视自身、客体与历史条件关系后的辩证把握。启蒙精神要求“不断激活一种态度,一种哲学精神,即对自己历史时代的批判”^[28]。启蒙精神面对不同时代,其批判对象、内涵、视角亦不同。康德时代,教条表现为宗教和封建专制,启蒙便历史地表现为以人为目的、以个体为目的去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而随着物质崇拜和个人主义成为新教条,启蒙就表现为激活主体理性,使其从新教条中解放出来^[29]。“道”一“名”易,永恒的启蒙精神不必锚定于个体主义,以个体为目的有时是启蒙主张,有时可能是启蒙批判的对象。启蒙的精神形式与历史内容不宜混合为一。

诚然,启蒙内含以人为目的的原则,但不视之为“迷思”(myth)。在人的全面解放,即人作目的的全面实现前,人的存在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难以回避人作手段的客观事实,难以回避人作手段的具体表现因历史条件而异的必然性。面对这些客观制约,启蒙精神要求不教条主义地对待人作目的的原则,以历史合理的态度把握人作目的与人作手段的关系,尤其是二者在“个体-群体”互动中的复杂性。一方面,任何时候都把人作目的直接等同于个体作目的,排斥不同个体协同应对群体危机的潜在必要性,便会陷入教条,伤害群体和个体的存在和解放,或被用来掩盖以自我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的事实,这与只强调人作手段而无视人作目的的一样危险。另一方面,任何时候都以群体目的为名义强调人作手段,则压制个体作目的并实质伤害人作目的的原则,也有违启蒙精神。真正的启蒙精神不执着于目的或手段,也不执着于个体性和群体性孰先孰后,而在于根据历史条件自主调整,使人作手段与人作目的、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达到统一。要言之,启蒙是普遍与特殊、永恒与历史的对立统一,也是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

周氏兄弟复古思想中,反封建和古代理想人格

想象从破、立两个角度反抗思想他治、追求个体思想解放，民族主义则以独特方式体现启蒙精神。

民族身份是“在与他者、异族交往时碰撞和反思中产生的”^[30]，是人的群体性特征之一，有多种内涵和表现，与个体性既相促进，也相制约。倘若任何时候都将个体自由绝对化，并与民族对立起来，无视个体与民族互为手段、互为目的的关系，理论上简单化、专断化，实践上不利协调群体行动应对族群挑战，最终将伤害个体生存和自由，这种思想将“（个体的）人作为目的”教条化，恐有违启蒙精神。反之亦然。周氏兄弟的民族主义注重个体又不绝对化，注重民族又不帝国化，是批判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深具启蒙精神。

首先，周氏兄弟重释排满运动，凸出反封建性质。他们“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31]。他们从尊“王”到革“王”，且不为另立汉“王”，而是追求“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32]的精神，希望建立“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的“人国”^[33]。可见，他们借鉴梁氏儒家批判，注入古代理想人格想象来凸显反封建精神。同时，他们虽注重个体，“人国”中却仍有民族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又超越章氏“姬汉”“东夏”之论，超越满汉之分，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民族主义。

其次，“人国”愿景也批判维新派资本主义改良方案。梁启超倡导西方制度，其民族想象以进化论为预设，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范，强调群治^[34]。鲁迅批评其“众治”^[35]只让国民“尽义务”^[36]，无视个人自由权利，故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37]，还援引尼采“野人”精神，称“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38]，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果，“野人”精神是因，民族振兴关键在使国人获得“野人”般的主体性精神。他还用生物“反种”（返祖）现象作比，称恢复人的主体性精神如同使动物“未驯以前状，复现于今日”^[39]。“野人”“反种”两个比喻使“复古”获得反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含义，体现鲁迅以“非‘近世文明’

的文明观”^[40]对抗梁启超“蛮野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人”^[41]的进化论。同时，古民说与新民说也构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纲领：一个回顾历史，强调个体思想自由和抗争，另一个前瞻，强调自治的现代公民政治素质。

再者，周氏兄弟还以文化民族主义批判（自我）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者“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42]。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华夷之辨，近现代转变为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章太炎曾担忧“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43]，受其影响，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44]，也有文化民族主义情怀。他希望用文字复古延续古代文化血脉，抵制“同文字”“弃祖国”^[45]的世界语主张。同时，他也警惕民族主义极端化，批判西方“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46]，批判“尚齐一”^[47]论调，提醒国人要警惕民族主义蜕变为文化帝国主义或（自我）文化殖民主义，倡导文化多样性，体现“多元文明观”^[48]。

总之，启蒙精髓是反抗教条和思想他治，不同时期表现不同。面对民族这一客观存在，启蒙精神不是简单地将民族与个体对立起来，而是根据特定历史条件对种种民族主义教条进行批判，接受中有拒绝，拒绝中有接受。清末民族危机中，《域外小说集》写作前后，周氏兄弟复古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是对种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和祛魅，内含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启蒙精神。

二 启蒙（翻译）文学及陌生化技巧

启蒙精神不只是周氏兄弟自身的思维品质，也是其社会文化实践目标。他们希望国人摆脱各种思想文化束缚，养成主体性精神。他们选文学为启蒙手段，形成启蒙文学。启蒙文学虽有审美功能，但以认识功能为主。《域外小说集》1909年序就引导读者注意启蒙维度：“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49]他们

希望读者从译作的“心声”“神思”获得启发,形成“性解思惟”。1920年序称该译旨在“转移性情”“改造社会”^[50],再次确认译作的启蒙定位。

启蒙文学观的形成,得益于周氏兄弟对西方思想启蒙手段和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双向改造。鲁迅认为,文学比学术更直观,他举“冰”为例,“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51]。周作人也认为,学术“区域甚拘,唯利小群”,“唯供学子研治之用”,文学“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52]。因而,他们未盲从西方用学术作启蒙手段,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改用文学。其实,学术和文学作为启蒙手段各有长短,前者理性但艰深,后者感性但感染力强。中国传统重修辞轻思辨,文学易占上风,却未必比学术启蒙更合理,毕竟轻视逻辑会影响公共对话,社会危机便难有效化解,常致问题积重难返。不过,面对民族危机,周氏兄弟用感染力强、见效快、影响大的文学作启蒙手段,有历史合理性。

此外,周氏兄弟发掘重释中国文学传统,在清末文学演变基础上有所推进。中国传统一向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53]。严复对传统注入西方现代思想,提出启民智纲领,《天演论》是一次尝试。他用桐城派文学语言包装现代伦理思想,以期改造国人伦理观。不过,表面是“启”,实则是“教”,文学于严复是“糖衣”^[54],未具本体地位。梁启超“新小说”才确立其本体地位。梁之“群治”与其说完全继承孔子“兴观群怨”,毋宁说适度融入严“群学肆言”之“群”及“群己权界”之“群”,弱化了个体借文学表达“合群”意愿的功能,强化了“治”的维度,从而使文学的政治属性十分突出^[55]。因而,严、梁文学观和文学实践侧重政治教育,不重视启发个体批判意识,培养个体主体性精神,他们的“民”是“众”,是政治教育对象和国家富强手段,个体独立性、主体性未受重视。他们的文学尚不真正构成启蒙文学。为了修正严、梁重“群”轻“个”倾向,鲁迅重新发掘古代“诗言志”传统。“诗言志”初指“情感体验就

必须合乎礼的规范,其价值取向就必须合乎群体意志”,后来随着诗歌从仪式转变为创作,“志”的群体仪式功能渐被个体化情感替代,“诗”的抒情传统遂由“群体表达方式转向真正创作意义上的个性表达”^[56]。鲁迅着重批判儒家“持人性情”文学观,特地前置“志”的个性表达维度,强调文学“撷人”之力,突出文学涵养个体“神思”的功能。《域外小说集》序称“性解思惟,实寓于此”^[57],正是延续这一独特视角。但是,鲁迅批判“持人性情”封建文学观的同时,也批判“弃祖国”的论调,追求延续民族文化血脉,这表明他仍保持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并没有完全剔除文学的“群”的维度。因此,与其说当时周氏兄弟启蒙文学的目标是唤醒个人主义意识,毋宁说他们是在诸多批判对话中探索一种新的、更平衡更合理的“个”与“群”关系,探索个体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合理结合,以便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所以说,周氏兄弟既非重蹈史上的复古运动,亦非照搬西方启蒙运动。他们既开辟与中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启蒙新手段,又借鉴启蒙精神重释古代文学精神,使之与西方现代启蒙思想融合,从而批判回应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教条,形成了亦古亦新、亦中亦外、亦个亦群的启蒙文学。

周氏兄弟把启蒙文学延伸到翻译领域,以翻译作启蒙手段,形成启蒙翻译文学,《域外小说集》正是其产物。这一延伸在情理之中,毕竟,启蒙诉求源自本土文化的某种不足,引入文化体系外要素便于寄寓本土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诉求。这也意味着,源语文化和原作须与译入语文化有历史处境相似性,译者在选材中须发挥高度主体性。处境相似性原则决定了周氏兄弟启蒙翻译文学的潜在来源,即同处被压迫处境的民族的文学,因而,他们不得不扩大选项,也就不得不采用“转译”。

他们的启蒙翻译文学除了承载他们的本土思想启蒙诉求,也是对当时文学翻译思想和实践的批判改造,即在文学翻译中建立“信”与“达”、“求真”与“致用”的共生关系,重新界定翻译身份和伦理。严复以“达”为主导,“题曰达旨,不云笔译”^[58],这种自责源自无法调适翻译思想传统规约和翻译实践当下需求的矛盾,鲁迅则试图展

示新的模式，既要“弗失文情”，力现原作特征，又要追求达旨，使译作“虽大涛之微涖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59]。他们对“信”的真正贯彻，不无回归佛经翻译传统的意味，但又并非完全回归，而是重置了原作译作的相互关系——佛经翻译传统中，尽管译作的实际传播效果并非不重要，但“教义”的神圣性赋予原作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译作也就只是附庸，而在周氏兄弟启蒙翻译文学中，本土启蒙诉求前置了译作的当下性、本土性、独立性，译作不再是附庸。这是对原作的另一种尊重，它更多基于平等意识和共情，是译者的主动选择，忽视这种区别，用佛经翻译中的忠实论来描述周氏兄弟对原作的尊重，恐会低估《域外小说集》在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中的地位，低估其译者序在近现代翻译思想史中的突破和贡献，尽管有关论断本意是肯定其贡献。

那么，启蒙（翻译）文学如何启蒙？周作人回忆他们与梁启超文学观之异同时说，“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60]。这表达了他们对文学启蒙方式的认知，文学虽要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却不能像梁氏小说那样直接说教。确实，启蒙精神对启蒙方式有着内在规定性。福柯指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真正意义在于确保理性“合理使用”（legitimate use），“不合理使用理性只会导致教条主义和他治”^[61]。即是说，启蒙精神要求避免思想他治，注重启发被启蒙者使用理性。那么，启蒙文学也不宜直接说教，而是要启发读者独立思考。启蒙翻译文学也是同理。而且，启蒙翻译文学还须符合翻译的先验规定——译作再现原作，否则不能称翻译，只能称改作或改编。对于启蒙翻译文学的双重责任，《域外小说集》1909年序有所反映，既要“信”，又要“达”，而且，他们特地采用“寓”的方式，意在避免说教，提醒读者注意译作的本土讽喻。“寓”字展示了对原作意义跨文化增殖的意识，这是“求真”与“致用”在文本跨文化流传中得以共生的理论基础，也为译者必要的本土化操作开辟空间。后来鲁迅又说：“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

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62]显然，他心中的启蒙翻译文学必须也可以兼顾移情益智和异域旅行般的阅读体验。

启蒙文学如何避免说教？文学是语言文字的技艺，作品要既启发又不说教，关键在写作技巧能激发读者反思现实，间接生产知识。即，启蒙文学技巧承担反映现实和启发读者反思现实的双重责任。它既指涉现实（包括心理现实和外部现实），又留下思考空间，让读者自主判断和独立形成思想认识。“陌生化”（estrangement/defamiliarization）理论对此有深刻揭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ij）说，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使我们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使我们感觉到事物，使石头像石头的样子。艺术的目的是表达人们在感知事物而不是认知事物时的感受。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把时间拉长。^[63]

“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原意“奇异化”，却因“犯了语法错误”，少写一个“н”，结果“奇怪的”变成“陌生化”^[64]。可见，陌生化并非陌生，而指作者通过语言变异（deviation）促使读者凝视文本。其用意不只是通常理解的“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什克洛夫斯基的人本主义视角看来，战争是极可怕的自杀行为，其根源是世界丧失鲜活感知力、对苦痛麻木不仁。沉沦的艺术对此难辞其咎，它无法让人认识到生活的真正价值，无形中使人对战争的残酷熟视无睹”，因而，什氏主张通过陌生化，通过艺术形式创新，“促进更健康的人性，用好的文学磨练人性对痛苦和危险的意识，使人学习避免（或不忘）战争”^[65]。即是说，陌生化除“感知过程”“审美目的”外，更重要的还有对人们的惯常认知“解自动化”（de-automation），激发读者重新认识事物。人们并非认识物自体，而是特定视角下建构客体；视角受群体、惯性影响，认知受其塑造，形成特定主客关系。陌生化是用新的方式呈现事物，将主体

置于新视角下,促使主体反思过往视角,对客体再客体化,重塑主客关系。思想与语言一体两面,习以为常的认知表现为习惯性语言;将认知“解自动化”,关键在于抵制习惯性语言,质疑其建构的“现实”。陌生化的语言便“旨在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现象从熟悉的标签中解放出来,正是这些标签阻碍了人们当下对这些社会现象的理解”^[66],目的是促使读者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事物,建立新的主客关系、新的“现实”。所以,陌生化具有激发反思、摆脱旧的社会文化、催生新知识的认识功能,是富有潜力的启蒙文学技巧。

陌生化技巧大量用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许多作品试验各种新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刻画资本主义种种问题,希望引起反思。《域外小说集》中作品多属此类。这些原作多用“诗化叙事”,“作品往往不依靠情节去叙事,没有清晰完整的情节,甚至没有故事,只有不连贯的碎片式的生活场景,人物主观的感觉与想象,某种情景交融的景致”^[67]。陌生化叙事使作品摆脱传统的情节连贯模式,构建断断续续的主客场景交替,前景化(foreground)人物心理活动,凸显人物心理困惑,意在引起读者对社会的反思。周氏兄弟指出作品“结构缜密,情思幽眇”^[68],显然把握了原作的陌生化叙事技巧。

那么,面对原作的陌生化技巧,译者如何处理?如何在翻译中启蒙?显然,启蒙文学译者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呈现原作技巧及其描写的现实,助读者开拓跨文化视野,又要使译作陌生化技巧介入译入语文化,启发读者反思本土文化。尽管积极主动的读者在跨文化阅读中常会展开本土联想,但当原作通过陌生化语言内嵌文化批判和反思时,译者亦不宜单靠读者的主动联想,而是有责任设计与原作相仿的技巧和语言,在译作中内嵌本土文化批判和反思。问题是,原作陌生化技巧在译入语文化中易变成纯粹的“陌生”,流失文化意涵,不易引起本土联想,这要求译者除了注重忠实,还须能动地采取转移补偿的翻译策略,在文本另一处用另一方式模仿原作陌生化技巧,同时又使译作也能激发本土联想和反思。周氏兄弟的文字复古就是他们发挥能动性,采用补偿策略,将陌生化技巧转移到文字

形式层面的结果——技巧层面,这是跨文化模仿;文字层面,这是本土化介入。

总之,周氏兄弟作为译者的启蒙精神和宗旨重置了翻译中的本土异域关系,前置本土性,使异域文本在跨文化移位后服务于本土文学文化革新。启蒙赋予他们的文学翻译以现代性品质。这种现代性不只是忠实再现原作现代特征,更在于通过巧妙再现特征而介入本土。巧妙,指他们作为译者展现启蒙精神,不拘于忠与不忠的对立,也非异化归化择一,更非直接说教,而是利用文本多层性和符号多维性,统筹翻译策略和文学技巧,在译文某一层面、维度追求忠实,以另一层面、维度上艺术性地介入本土,从而既翻译,又启蒙。若缺乏启蒙精神,译者便会陷于忠与不忠的二元困境,能动性受制,难以统筹翻译策略和文学技巧,难以兼顾忠实源文与本土启蒙,难以弥合翻译定义的传统性和翻译实践的现代性,就难有启蒙翻译文学。要言之,他们作为译者的启蒙精神是其翻译文学的基础。

三 文字复古作为陌生化抵抗

《域外小说集》的忠实广为人知,尽管有关评价不无溢美之词;相比下,其文字复古的本土介入功能则有待揭示。该书序言开篇即称,“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69],矛头暗指本土名人译作,可见文字形式选择在其整个翻译实践和思想中是重中之重,而与“名人”对比又是他们的首要考量。虽自称“朴讷”,但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70],意在提醒读者译作语言风格实有意为之。因此,朴讷古文除了以转移补偿策略模仿原作陌生化技巧外,也是译者对本土主流译作语言的陌生化抵抗,是译者批判本土主流(翻译)修辞的启蒙(翻译)文学技巧。作为陌生化技巧,朴讷古文包含三种变异特征:朴正、质朴、讷涩。周氏兄弟借这三种特征分别挑战不同“名人”。

首先,朴正即通过“本字古义”^[71],达到用字纯正的目的。钱玄同回忆,周氏兄弟从章太炎处“了解古训,以期用字妥帖”,所以“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72]。“雅驯”是章太炎对严复的矫正。严视“雅”为“文”,章则重温张晏故训

指出,“尔,近也;雅,正也”^[73],“正”就指“本字古义”,是文字训诂求真求实的精神。周氏兄弟一方面经章太炎继承戴震“释本义”“据本经”^[74]的训诂思想,同时也与佛经翻译传统不无关联,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就重视“用训诂来定字”^[75]。例如《漫》中特别古僻的字有42个(下表1),其中,“莫”字在《漫》和《域外小说集》序均出现,即“暮”,但章太炎指出,象形字“莫”已包含“日”,再加“日”于下,“最无理”。对于“然”字,章指出“加火旁作燃者不通,以然既从火也”,而“頰当读免,即颯”,“人皆谓俯即頰,实则不相关”。又如,《戚施》选入《域外小说集》后有50处修改,含17处字体订正(下表2)^[76]。如此种种,如果说《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反映了章太炎对

古字考据之严谨,那么,周氏兄弟译作采用上述古字,正是受其训诂精神影响。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在文字层面延续古代文化血脉,反对世界语主张,防止文字以讹传讹、文化失源失真,同时也防止西方文化殖民。当然,他们虽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却未像当时有的国粹派那样陷入自负的封闭论调,《域外小说集》1909年封面把先秦篆文与古希腊少女抱琴图并置,还系统引进西式标点符号,就是为了表达开放的、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主义情怀。

其次,质朴指朴素无华,旨在超越严复及桐城派“雅”的修辞观。人们一般根据鲁迅1932年致增田涉的信认为“名人”指林纾^[77],这种理解并不完整。当时译界名人还有严复。周氏兄弟既关注林译,也着迷于严译,“一有闲空,就照例地……

表 1

漫:欺	鍼:针	罽:门屏	恚:恨	斯:俗作撕
齟:牙根	咲:同笑	旻:天空	靖:通静	曜:日光
啗:嘻	𦏧:尖利	黠:黑色	沈:深	肱:胸骨
頰:颯	媚:悦	闢:打开	歎:鸣	訑:欺诈
聒:同聒,附耳细声语	俾:职、使	然:烧	覃:深	緇:黑色
诃:同“呵”	脬:同吻/脬,即泔	睽:暂视貌	覩:睹	闔:同開
蚤:通早	愆:过失	莫:暮	燄:同“焰”	闔:门扉
匈:胸之本字	踞:长跪	撝:逼	鰕生:小生	鞫:审问
𦏧:闪	晒:微笑			

表 2

屈 → 曲	菸草 → 煙艸	白 → 皙	碩 → 碩	婿 → 婿	隳 → 墮
映 → 曠	憔悴 → 蕉萃	蚩 → 嗤	慙 → 慚	皂 → 草	覓 → 魂
童 → 僮	使 → 俾	寧 → 寧	須 → 需	辦 → 辨	

看《天演论》”^[78]。他们译《域外小说集》之前对林、严译作均有不满意,原因又不同——不满林译删节过大,因而提出“弗失文情”;不满严译则主要受章太炎对严“‘载飞载鸣’,不脱八股习气”^[79]的批评影响。鲁迅序中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80],就特地删去“雅”字,代之以“朴”,不免让人想起章氏“汰华辞”^[81]的主张。

例 1: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

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蚊虻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82]

例 2: 吾幼尝见豹动物苑中,致碍构思之力,且梗塞吾思久久。此豹甚异他兽,状不惘然,或怒目睨观者,特往来两隅间,由此涉彼,行迹反复相同,合于数术。肤黄金色。每行必触檻闌之一,不及他闌。其首下锐,頰而

行，目不旁睐。^[83]

同为描写景物，严复译作（例1）形式讲究，不仅多用四字词，还用对仗，“怒生”对“交加”，“畏日”对“严霜”，“鸟兽之践啄”对“蚁蜂之齧伤”。这被鲁迅批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84]。鲁迅译作（例2）完全剔除形式对仗和韵律，文字凝练质实，古朴苍劲。

周氏兄弟去“雅”为“朴”，并非只是佛经翻译史上“文质之争”的再现，“桐城气息”一词说明了其真正的批判目标。严复曾将译作寄给桐城派吴汝纶，吴作序赞其“雄于文”，“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言下之意已将严视为“道胜而文至”一类^[85]。桐城派自居“文以卫道”，“文”效韩欧，“道”宗理学。姚鼐就说，“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86]。鲁迅十分不认同桐城派^[87]。他不仅“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88]。《摩罗诗力说》中“持人性情”^[89]一语，就是在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他提出，文学旨在“涵养人之神思”，“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愉悦”^[90]，周作人也说，文学旨在“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91]，均有与桐城派相抗衡的意味。所以说，周氏兄弟以“朴”代“雅”，表面针对译作文体，真正目的是消解桐城派权威，颠覆其背后宋明理学纲常伦理的权威地位，解除国人的思想束缚。

为配合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他们特地翻译了法国摩波商（即莫泊桑）的《月夜》。主人公长老摩理难反对男情女爱，认为“天帝造作女子，惟以差人，试其心耳，故人与之近，当善防卫，且怀戒心”^[92]。不料，长老爱侄堕入爱河，月夜与男友幽会，长老得知，欲前往训教，却见夜色柔美，不觉心神荡漾，竟思“天帝奚为是耶？如神造昏夜，俾人偃息，无复有知，则胡为美愈白昼，夜色柔和，过于黄昏及黎明耶？且星光艳冶，实胜朝日……胡为以彼妙光，遍烛幽隐耶？善歌之鸟，胡不归其巢，而啁于玄夜耶？”^[93]显然，作者借长老的困惑来讽刺封建道德之反人性。而长老的观念几乎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法国版，周氏兄弟

翻译这篇小说，便有讽刺封建道德的意义。

再者，讷涩指行文不畅^[94]，意在对抗梁启超“新民体”。人们很少把《城外小说集》序中的“名人”与梁氏联系起来，但周氏兄弟创办《新生》时，确实不排除有对抗梁氏之意。当时正值革命派《民报》与改良派《新民丛报》论战，在日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其中，而周氏兄弟留日前期受梁氏影响较深，留日后期转向章氏民族革命思想。他们发现，梁氏除用《新民丛报》进行政治宣传外，还辅以《新小说》作文化宣传，而“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95]，所以他们决定筹办《新生》，用以对抗《新小说》。《新生》虽筹办未果，但计划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关批判文章后来陆续发表。《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生》的文艺实践部分，便延续上述对抗思路，代表着人本主义文化民族主义革命者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改良者的意识形态的对抗。

鲁迅留日后期与梁启超修辞观的对立明显反映在对严复译作语言的态度上。梁氏批评《原富》：“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96]而鲁迅虽不赞同严“雅”的风格，却认同其用古字的选择。所以，他也用先秦古文来翻译，还特地用篆文作封面标题字体，其“古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氏兄弟古文态度背后，是读者定位与梁氏明显不同。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是“学童”，而是“卓特之士”，颇似严复的精英读者意识。鲁迅20世纪30年代还进一步区分甲乙丙三类读者，并主要瞄准甲类读者，延续了面向“卓特之士”的思路。1909年的鲁迅完全放弃留日前期初涉翻译时文白兼用的风格，刻意强调自己语言讷涩，与梁氏的“流畅锐达”形成鲜明对比，似有以“古民体”配合“古民说”，对抗梁氏“新民体”“新民说”之意——当然，他们并未使用“古民体”这个概念。

例3：嗟夫，惟是亦谩，其地独幽闇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虚，欠申于斯，而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顾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

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
伤哉！^[97]

例4：夫薰以香而自烧，翠以羽而见杀，志士之处世，宁为玉碎，耻为瓦全。愿兰桂之被摧，厌萧艾以自存。夫生而有益于世，死何以闻于后。设使与天地同寿，亦复何益。是以蹈前圣之祸机而不顾，犯灾害而不悔也。^[98]

梁译（例4）文白相间，保留对仗句式和修辞，行文流畅锐达，表达慷慨激昂之情。鲁迅（例3）则主要关注用字准确、纯正，对韵律节奏全无追求，行文钝涩不畅，表达低语沉痛之思。鲁迅这种行文客观上有助于降低读者阅读速度，使读者留心细读，品味原作丰富想象力和人物复杂心理，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和批判用意。《域外小说集》序提醒读者“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99]，正是此意。

周氏兄弟还借古僻字来凸显小说主题，含蓄批判梁启超的文明进化论论调。契诃夫短篇小说《戚施》初由周作人译出，原译名《庄中》^[100]，《域外小说集》中篇名“戚施”应是选入小说集后的改动，以凸显作品主题思想。小说主人公罗舍微支是进化论者，对律师迈伊尔宣扬人种繁殖进化论——贵族配贵族，后代愈贵，血统不可被贱民所杂；贱民若跻身上流社会，社会必将后退，而后退又是自然淘汰贱民，使上流社会复归纯粹高贵的方式。不料，迈伊尔自称平民出身！两人谈话尴尬结束，迈伊尔离去。问题是，罗舍微支热情招待迈伊尔，本来是想联络感情，将其纳为女婿，当迈伊尔自告“工人子”身份而离去时，罗舍微支父女的美好愿望便告落空，二人遂陷懊恼之中。改动后的篇名“戚施”为古汉语，意为蟾蜍、蛤蟆，是契诃夫给主人公罗舍微支取的绰号，旨在讽刺主人公罗舍微支是癞蛤蟆，想通过吃天鹅肉来达到“进化”的目的。周氏兄弟将该小说选入《域外小说集》时，特地把周作人原译中“蝦蟇”“戚施”两译名统一为“戚施”，且用为标题，似有意用古奥、文绉绉的“戚施”给读者一个“惊喜”，读者若留心翻查，了解“戚施”真实含义，便会感到回味无穷。

总之，《域外小说集》中的古文除了在语义层面再现原作，以及用补偿翻译策略将陌生化技巧转

移到文字文体层面，还特意彰显朴正、质朴、讷涩等文体变异特性，从而展开多向本土对话，表达多种文化批判意涵。

结 语

文字复古是承载周氏兄弟启蒙意图的艺术手段。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有着反封建、追求思想解放、抵抗性文学技巧等共同点，是后者的先行试验，只是因时代不同、文字形式不同，一个受众极少，一个走向大众。可见，启蒙文学生命力扎根于本土社会现实与实践，受制于文字形式。内容、形式与民众有隔阂的作品，启蒙效果恐微。这也反映了启蒙文学的内在规定性——既偏离又联系，既批判又体认，既超越又介入。因而，陌生化的针对性和度就极重要，启蒙者须对启蒙对象有清晰认知，对目标合理定位，对文字变异度审慎拿捏。翻译又常因跨语言文化异质性而“扭曲”符号关系，取径异化的译作尤其易产生另一种性质的语言变异，或者说偏离，以至于译作中两种去中心的符号变异相交织，陌生性与陌生化性相渗透，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便易被淹没，遮盖陌生化技巧背后的启蒙意图，对启蒙翻译文学译者来说无疑是极大挑战。周氏兄弟文字复古的事与愿违，也就不难理解。

尽管如此，周氏兄弟的试验仍是宝贵的。他们在思想和文字层面对“古”这一概念采取浪漫化想象和挪用，既跳出中国传统循环时间观和西方线性时间观，将“古”与“新”作跨文化跨时代并置，又试图在文化创新中兼顾文化延续，在对外求鉴中检视本土古代资源的当代价值。他们以古文译新声，不只是文体问题，更蕴含攸关文化发展的思想课题。古文似保守，实激进，富含启示：从本土走向全球、传统走向现代，译者作为（跨）文化生产者，应摆脱对文化要素之意义的固化认知，从当代实践出发，发挥主体性精神，探索重组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方法，以启发读者重新认识新现实，建立新价值，建构新主客关系、新的主体身份。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翻译作为‘鉴’：鲁迅翻译思想的当代启示研究”（项

目编号19YJC740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得益于孙艺风教授、王东风教授、王岫庐副教授、陈庆副教授及审稿专家先后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并得到胡传吉教授、李文静博士提供文献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1][67] 杨联芬:《〈域外小说集〉与鲁迅的新文学理念》,《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

[2] 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第7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 叶依群:《〈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接受》,第15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255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5] 赵亮:《〈域外小说集〉: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0期。

[6][7][8][19][21][22][24][32][33][35][36][37][38][39][44][45][46][47][49][51][57][59][68][69][80][89][90][99]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第82页,第139页,第88页,第84页,第79页,第83页,第159页,第114页,第139页,第139页,第147页,第129页,第80页,第90页,第139页,第147页,第153页,第147页,第159页,第88页,第159页,第159页,第164页,第159页,第164页,第84页,第87页,第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9][11][17][60][71][87][88][95]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2页,第45页,第141页,第141—142页,第148页,第72页,第50页,第8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0][18][52][91]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中国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期。

[12] 参见《画者鲁迅》,王锡荣编,第8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13]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有关“古学复兴”历史思潮的讨论,详见罗志田《中国的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汉学研究》2002

年第1期。

[15] 梁启超:《论自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3页。

[1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页。

[20] 陈漱渝提出,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经章太炎影响了鲁迅。参见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第84页,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23] 鲁迅的“神思”融入了西方文论的“想象”。参见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9期;党圣元《中西文论中“神思”与“想象”的比较及会通》,《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

[25] 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ine Kleingeld (ed. & intro.), D. L. Colclasure (trans.) *Toward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Peace and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7.

[26][27][28][61] M.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 38, p. 43, p. 42, p. 38.

[29] 周宪指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同根同源”(周宪:《文化的现代性对抗启蒙的现代性》,《粤海风》1998年第6期),该根源即启蒙精神。审美现代性反抗启蒙现代性,是拯救而非否定启蒙。

[30] 周宪、赵稀方、刘俊等:《民族认同:东方历史与民族主义》,《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1期。

[31] 周作人:《元旦试笔》,《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第12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4] 严复曾推崇这种国家学说,章太炎则批评其“蔽智”“愚天下”。参见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36页。

[40][48] 董炳月:《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明观——以〈文化偏至论〉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9期。

[41] 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页。

[42]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43] 章太炎:《与宋恕》,《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0]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2卷,第17页。

- [53] 参见丁国旗《文艺的“教化”作用论纲》，《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 [54] 王佐良：《Two Early Translators Reconsidered》，《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2期。
- [55] 有关梁、孔之间“群”的关系，参见董炳月《“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 [56] 王秀臣：《“诗言志”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 [58] 严复：《译例言》，见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第xi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62]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9卷，第186页。
- [63]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trans. & intro.),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2; 汉译见钱佼汝《“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 [64] 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第80—8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 [65] Galin Tihanov, “The Politics of Estrangement: The Case of the Early Shklovsky”, *Poetics Today*, vol. 26, no. 4(2005), pp. 665–696.
- [66] Bertolt Brecht, “A Short Organum for the Theatre”, in 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e(e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p.121.
- [7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第29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 [72]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73] 章太炎：《小学略说》，《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8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信达雅”与“诚达文”同用，“信”同“诚”，“雅”同“文”，详见严复《译例言》，见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第xi页。
- [74] 参见戴震《戴震文集》，第14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 [75] 马祖毅：《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翻译论集》，罗新璋编，第47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 [76] 表1中标下划线的字参见《章太炎全集·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其余在该笔记查询不到的字参见《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主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莫”“然”“頔”参见《章太炎全集·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第54页，412页，369页。《戚施》原译名《庄中》，参见尾注100。其余33处涉及虚词、人名或赘字。
- [77][84]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6卷，第836页，第620—621页。
- [78]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4卷，第69页。
- [79] 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36页。
- [81] 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18页。
- [82] 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第1页。
- [83][97] 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一），第71—72页，第7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影印版。
- [85] 吴汝纶：《序》，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第vi页。
- [86] 姚鼐：《复汪进士辉祖书》，《惜抱轩诗文集》，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92][93] 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二），第14页，第1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影印版。
- [94] 李寄称“讷涩”为“间离的文体效果”，参见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第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 [96] 梁启超：《介绍新著〈原富〉》，《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
- [98] 梁启超：《佳人奇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15页。
- [100] 参见契诃夫《庄中》，独应译，《河南》1908年第8期。该小说今译名《在庄园里》，参见王晶晶《翻译“现代主义”——包天笑的译作〈六号室〉》，《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